

人工智能时代交往方式对青年婚恋观的重塑

李晓纯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正经历深刻变革,进而重塑了青年的婚恋观。本文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交往方式对青年婚恋观的重塑。人工智能时代交往方式发生改变,改变了传统的线下交往模式,虚拟伴侣与情感替代现象涌现;这种交往方式影响青年的社会关系,导致交往范围扩大化,交往关系趋于浅层次化。进而,交往方式的改变对青年的婚恋观造成冲击,使得婚恋观念多元开放、婚恋舆论在网络传播扩散、婚恋功能面临技术替代;从而使青年婚恋观表现出观念个性化、行为非传统化、婚育意愿弱化的特征。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重构青年社会交往秩序的方法路径,包括加强青年认知行为引导和实施网络技术优化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建立健康的社会交往关系,形成健康的婚恋观,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交往方式;青年;婚恋观

[作者简介]李晓纯(2000—),女,广东揭阳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研究”(项目编号:GD23XMK14)。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2017>

[中图分类号] D669.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在人工智能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日常生活与社会的全面媒介化进程,情感社交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其网络用户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网络信息技术对青年群体成长环境的深刻影响,使其生活空间分化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而青年人尤其是育龄人口的婚恋观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网络业态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平台的内涵与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展,青年人的社交需求日益多元化,婚恋模式也更加多样化。本文将通过“技术—交往方式—观念重塑”链条,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交往方式对青年婚恋观的重塑。

一、人工智能时代交往方式的改变

随着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时刻保持连线成为青年的基本生活方式,数字媒介建构的交往空间已然成为青年交往与生活呈现的重要场域。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更便捷、更普遍的接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也重新定义了社会关系和个体身份的构建。

(一)人工智能对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

1.从线下到线上: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

在数字化时代,青年初次接触网络持续降低,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围绕着数字媒介建构的网络场景展开。丰富多样的媒体形式和便捷的移动

设备,拓宽了年轻人社交互动的范围,愈发适应数字媒介的交往逻辑。人类的交往行为具有工具性、空间性和社会性,数字媒介改变了这三种属性的表现方式,即交往的工具使用、空间场景和社会化过程都因数字媒介的应用而发生改变。在工具维度,“云交往”主要发生在数字媒体平台上,像“微信”“抖音”“小红书”等这类平台,几乎涵盖了个人社交活动的方方面面,如信息沟通、意见发布、关系建立、协商合作、商品交易等等。在空间维度,“云交往”不断拓展、取代和融合人的社交行为,人们通过各种社交媒介建立复杂的联系,并在数字平台上聚集,人们的互动模式已从传统的“面对面”模式,转变为“点对点”或“端对端”模式。在社会维度,交流场景错综复杂地交织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经过重组的交流空间,人们也因此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形式。

2.从现实到虚拟:虚拟伴侣与情感替代

数字媒介中的虚拟交往能够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情感支持。基于人工智能生成的沉浸式交互场景,青年用户通过算法生成的“共同在场”感知获得社交陪伴体验,这种拟真性互动有效缓解了现实社交缺失带来的孤独感。虚拟社交的碎片化特征恰好契合了青年群体“微社交”需求,为其个体化生活方式的表达提供了数字化展演平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研究与产品开发中注入了对交往主

体的情感迎合,传统社会给予的社会支持逐步被智能技术和社会服务取代,模糊了虚实世界的边界,导致部分青年产生现实社交疏离倾向。由此,技术中介的社交模式在强化即时连接的同时,也催生了新型交往异化。当青年群体在虚拟空间获得足够的心理满足时,其现实社交意愿呈现边际递减效应,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了“断亲”“独居”等个体化的生活方式。

(二)交往方式改变对青年社会关系的影响

1.交往范围的扩大化

在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现实社会关系网络之外,网络空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交关系网络,能够移植、拓展,甚至独立培育新的现实社会关系,并充分发挥关系效用。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强关系与弱关系,数字社交平台不仅能维系既有社会关系,更能突破传统社交圈层的限制。数字社交媒介在弱关系培育和偶然关系建立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这些媒介使用“促使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相互连接,因而扩张了社会交往,超出自我认知的社会界定之边界”。虚拟交往能够满足青年探索未知领域的心理诉求,激发其主动拓展社交边界的动机;打破时空限制,使个体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动态化、碎片化的社交实践。

2.交往关系浅层次化

青年一边在社会支持网络中寻求安慰、抵制孤独,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一边在技术革新、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多重驱动下,不断加快交往的节奏。为了提高社交的效率,适应社会生活的全面加速,青年主动从复杂现实社交中抽身,在线上寻找“搭子”、成为“搭子”、解散“搭子”,以获取免等立取的社交快乐。青年通过快速建立、解散数字联结,实现社交需求的即时满足。青年的交往实践不再是一件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与精力的事情,具身的联结变成通信工具的联结,深刻的交往也被肤浅、临时的关系所代替,从而导致情感的浅层化及弱化,联结松散与脆弱,交往模式呈现出轻量化、弱关系的显著特征。

二、交往方式改变对青年婚恋观的重塑

当代青年成长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社交媒体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线上的交流方式跨越地域的限制,方便个体交流沟通的同时也在挤压现实世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碎片化的网络信息环绕在他们身边,极大地冲击了青年的婚恋观念与行为,影响着他们对婚姻形成系统且全面的认知。

(一)交往方式改变对青年婚恋观的冲击

1.婚恋观念的多元开放

个体化趋势下,青年的婚姻态度从原有固定不

变的习俗观念中解放出来,对于婚姻的态度呈现多元的特征,家庭结构多样化、灵活化,同居、单亲等家庭形式得到尊重、接纳。首先,青年人的性观念由传统保守转向开放自由。以家庭本位为核心的繁衍式性行为,逐渐向爱情本位的纯粹式性行为转变,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也不断提升。其次,青年人对未婚同居的接纳度逐渐增加。由于不以结婚为目的或以试婚为目的的恋爱与亲密关系盛行,青年人对婚前同居者的态度更加包容。自由的同居观念与人口结构变迁、地域流动等因素,共同推动婚恋形式更加多样化。最后,离婚观念更加开放,离婚态度更加坦然。青年人的离婚观念由保守传统向开放自主转变。传统婚姻伦理中的“家丑不可外扬”观念被个体幸福追求所替代,离婚从“难以启齿的家庭大事”变为“个体自主的私人小事”,不行就分、不好就换、不合就离的“逃跑”文化盛行。

2.婚恋舆论的网络传播

媒介化生存环境促使社会婚恋舆论呈现多元共生的复杂样态,既为新型婚恋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也加剧了不同观念间的碰撞与冲突。一是消极化婚恋认知的传播扩散。部分青年群体对婚姻制度的解构性解读,催生出“恋爱脑”“PUA”“婚姻是坟墓”等相对负面的婚恋观念,加剧了青年群体在婚恋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恐恋、恐婚、恐育等消极心理在舆论场域中不断被强化。二是娱乐化婚恋叙事的资本异化。婚恋议题在媒介商业化运作中呈现异化趋势。婚恋综艺节目为追求收视效果,过度渲染金钱至上的婚恋观、“快餐式”恋爱模式及超现实主义的伴侣期待,制造了虚假的婚恋焦虑,扭曲了青年对婚姻的认知。三是利益化婚恋话语的流量博弈。婚恋议题正成为流量经济的重要载体。一方面,部分商业主体通过制造婚恋焦虑实现营销目的,单身经济、搭子文化等概念被资本收编为盈利工具;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人践行并大肆宣传单身、离婚、不婚文化,通过建构“独立”“洒脱”的单身人设获取关注,甚至刻意制造争议话题博取流量。这种利益导向的话语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婚恋舆论的失真与极化。

3.婚姻功能的技术替代

青年人的情感满足由现实场景向虚拟空间转变。精神分析理论揭示的“自我—本我”冲突调节机制,替代性满足是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社会转型期婚恋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客观上催生了青年群体的情感转移现象。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时间贫困、婚恋成本攀升以及负面婚恋认知的代际传递,导致青年人现实情感动机弱化,恋爱代餐作为情感需求的替代性解决方案迅速流行。以“嗑CP”

为代表的虚拟情感实践,实质上是青年群体在婚恋期待与现实生活矛盾下的选择。青年人既渴望拥有甜蜜浪漫的爱情,又难以或不愿在现实生活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转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实现情感满足,达到爱情代偿的目的。尽管青年人可以在虚拟婚恋中习得相处方式和技能等,但虚拟情感与真实的恋爱感受有别,且长期沉浸于虚拟的爱情之中,可能强化理想伴侣的标准,进而加剧现实婚恋匹配的认知落差。

(二) 青年婚恋观念的重构与新特征

1. 婚恋观念的个性化

当代青年群体中正经历着家庭观念的结构性转变,传统的家族本位价值逐渐让位于个体幸福诉求。近年来,个人主义的婚恋价值观兴起,“成家”变为高度个人化的自主选择,直接削弱了传统家庭责任的约束力,体现在青年对“养儿防老”等传统义务的疏离,家庭功能也从传统的养老抚幼转向个人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构建的流动社会语境下,青年个体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强化自我认同的主体性,在处理亲密关系时展现出显著的理性化特征。他们的理想社交模式呈现出“亲密—独立”的双重诉求,强调人际边界的清晰界定。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己做主、讨厌相亲”,从社会地位上的“门当户对”到价值观上的“情投意合”,从情感中的“始终如一”到“好聚好散”,青年更加注重婚姻中的自我感受和体验。

2. 婚恋行为的非传统化

大众媒介加速了非传统婚恋行为的传播进程。首先,青年人逐渐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观念内化个体价值认同,进而突破传统婚姻的年龄规范与形式约束,表现为对经济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双重追求,更映射在单身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20年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由23.64岁攀升至24.33岁,其中女性初婚年龄增幅达0.84岁,男性达0.54岁,印证着婚恋观念与婚姻行为的同构性转变。其次,婚姻的稳定性下降,离婚率越来越高。1985—2023年间我国离婚率从0.44‰持续攀升至2.56‰,离结比更在2020年突破50%大关。一方面,当代青年的离婚自主权增强,加之其对离婚事件的心态更积极,因情感破裂等原因结束婚姻的可能性增加。为使离婚者做出更理性的婚姻选择,民法典提出了“离婚冷静期”制度,对离婚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是,2023年的离婚率仍达到2.56‰,说明除非理性因素外,离婚行为更受内生性观念变迁的影响。

3. 婚育意愿的弱化

青年人的婚恋观念变迁也影响着社会的生育

水平。一方面,生育不再是婚姻的必要目的,以“生养子女”衡量婚姻价值也不再是主流观念,青年人更加注重婚姻带来的幸福感,故降低生育数量或不生育而选择“丁克”;加之“丧偶式”育儿等现象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青年人的生育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生育压力和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之间相互重叠,看似单纯的生育压力中实际掺杂许多直接和间接抚育成本的压力,这些压力也影响着青年的婚育态度。育儿直接成本表现为可量化的经济支出,涵盖子女养育、教育投入等物质消耗;间接成本则涉及时间机会成本、健康损耗和心理负荷等隐性支出,与传统生育文化中的“养儿防老”工具性价值形成鲜明对比。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与人口流动常态化的双重作用下,生育的代际交换价值持续贬值,进一步削弱了青年的生育动机。受制于客观生育成本的推高、婚恋和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出生人口规模在2016年后出现七连降,2024年出生人口仅954万,且婚育观念转型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在逐渐加大。

三、青年人社会交往秩序重构的方法路径

(一) 加强青年认知行为引导

当代青年人的成长与发展备受关注,尤其是在虚拟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中,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观念与行为模式显得尤为关键。

其一,助力青年确立正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领青年遵循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秉持互惠共赢的理念去寻觅优质的虚拟社交圈子,亦能促使青年合理规划虚拟交往时长,还能够推动青年自发地守护虚拟交往的和谐氛围,成长为富有道德与正义感的网络参与者。对于青年而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首要在于辩证地认知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关联,达成自身价值的实现。

其二,引领青年习得思辨能力与真伪辨别能力,进而培育其独立的思辨意识。当青年与同质化群体构建虚拟交往联系时,应有意识地防范“茧房效应”“回声室效应”以及“从众效应”等潜在负面效应的干扰,在群体互动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接纳多元的观点与声音,并基于理性思维做出恰当的决策。与此同时,青年还需精准地权衡虚拟交往中的成本与收益,规避陷入泛泛而交、流于表面的错误交往模式,尽可能将自身的时间与精力倾注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交往关系之中,以此提升交往质量与效益。

(二) 实施网络技术优化举措

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环境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与海量其他信息相互交织。鉴于此,网络教育对象需自主对这些信息进行体验与认同,这便要求

基于网络信息引擎的特性实施技术优化举措。

其一,改进算法设计。鉴于以往算法依据公众兴趣偏好推送内容,探索“个性化推荐的反向路径”不失为一种良策。向用户推送与其浏览内容观点相悖的信息,这既能促进不同观点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也有助于提升用户的思辨能力。此外,构建“致力于提升信息对称性、削减同类信息推送量并增加异质信息分发的信息分发系统”同样值得探索,从而拓宽用户的信息视野。

其二,引导网络信息平台形成优良的网络环境。无论是个体提升自我辨识能力,还是对技术实施改进与监管举措,强调价值理性都能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此处所言的价值理性,具体涵盖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核心价值观。这对于深陷“信息茧房”的个体而言,乃是改善其思维模式的关键理论基石,能够对个体行为予以规范,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状态,同时也有助于在网络信息平台的交流中引导形成优良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阳,张攀.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青年群体的

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2):83-88.

[2]程宏燕,郭夏青.人工智能所致的交往异化探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9):70-74.

[3]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4]王敏芝.媒介化时代“云交往”的场景重构与伦理新困[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9):13-23.

[5]岳彩.青年交往的“加速”症候与“减速”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5(3):99-105.

[6]解为瀚.“搭子”社交: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野下的交往异化[J].探索与争鸣,2024(4):158-164,180.

[7]康义金.个体化作用下的“母胎单身”形成机制——以城市青年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1(12):33-39.

[8]王昕迪,胡鹏辉.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2(10):72-79.

[9]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10[EB/OL]. [2025-4-16].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6rp/indexch.htm>.

[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4[EB/OL]. [2025-4-16].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11]穆光宗.当代青年的“恐育”心理和生育观[J].人民论坛,2020(22):120-122.

The Reshaping of Youth's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by Interaction Style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 Xiao-chu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way of inter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which in turn reshapes the youth's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haping of youth's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by the way of interac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nges in the mode of interac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altered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mode of interac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virtual partners and emotional substitution has emerged. This mode of interaction affect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youth, leading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interac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shallow relationships. In turn, the change i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impacts on the youth's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making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diversified and open, the spread of marriage and love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diffusion, and the marriage and love function is facing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Thus, the youth's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shows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zation, non-traditional behavior, and weakened marital and child-breeding willingness characteristics. In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ological path to reconstruct the order of youth social interaction,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guidance of youth and implementing network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initiatives, aiming at guiding young people to establish healthy social relations, forming a healthy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action styles; youth;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